《壬辰雜編》與《金史》史源

陳學霖

一、

元好問遺山先生（一一九〇～一二五七），是東北女眞族所建立的大金王朝（一一一五～一二三四）的一代文宗，在國史上享有超然的地位。金源淪亡於蒙古之後，遺山退隱不仕，致力蒐集與編纂史料，在太原秀容（今山西忻州）韓巖村鄉居構築「野史亭」，欲以史筆自任。雖然素志未酬而歿，所撰的碑版誌銘，已刻或未刊的著作，如《中州集》、《金源君臣言行錄》、《壬辰雜編》等，都保存大量珍貴文獻記錄，爲元末官修《金史》所採摭資用。

遺山先生這一崇高的勵志與篤行，同時人的敍述與《金史》本身都有明證。例如郝經（一二二三～一二七五）撰〈遺山先生墓銘〉說：[1]

> 每以著作自任，以金源氏有天下，典章法度，幾及漢唐，國亡史興，己所當爲。……乃言于張公（張柔，一一九〇～一二六八），使之聞奏（蒙古大汗），願爲撰述。奏可，方闢館，爲人所沮而止。先生曰：「不可遂令一代之美，泯而不聞。」乃爲《中州集》百餘卷，又爲《金源君臣言行錄》，往來四方，采摭遺逸，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。……於是雜錄近世事者至百餘萬言，捆束委積，塞居數楹，名之曰「野史亭」，書未就而卒。嗚呼，先生可謂忠矣。……

《金史》卷一二六〈文藝下・元德明〉傳附子〈子好問〉據此又言：[2]

>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，以金源氏有天下，典章法度幾及漢、唐，國亡史作，己所當任。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（柔）家，乃言於張，願爲撰述，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。好問曰：「不可令一代之跡，泯而不傳。」乃搆亭於家，著

1 見元好問《遺山先生文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〈附錄〉，頁三上。〈墓銘〉原載郝經《陵川集》，見《四庫全書珍本》第四集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）卷三五，頁二下。

2 脫脫等纂《金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五）卷一二六，頁二七四二～四三。

述其上，因名曰「野史」，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，采摭所聞，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，至百餘萬言。今所傳者有《中州集》，及《壬辰雜編》若干卷。年六十八卒。纂修《金史》，多本其所著云。

關於元好問對纂修《金史》的貢獻，以及他遺下的詩文集，與所編《中州集》的史料價值，時賢已多有研究，不必贅言，本文謹將尚鮮注意的《壬辰雜編》作一探索分析。[3]

二、

從簿錄記注所載，《壬辰雜編》顯然是遺山晚年所編纂史料的一種，屬〈雜史〉類，紀事始於哀宗天興元年（一二三三），故以干支「壬辰」爲名。元朝翰林國史院不但庋藏是書，而且肯定其價值，到順帝至正三年～五年（一三四三～一三四五），設局纂修《金史》時，便著意剪裁採用。當時任三史總裁的翰林學士歐陽玄（一二八三～一三五七），在他的〈送振先宗丈歸祖庭〉詩序略說：[4]「近年奉詔修三史，一日，於翰林故府中攟金人遺書，得元遺山裕之寫《壬辰雜編》一帙。……」同時人蘇天爵（一二九四～一三五二）撰〈三史質疑〉又記：「(金）國亡之後，元好問述《壬辰雜編》、楊奐（一一八六～一二五五）《天興近鑑》、王鶚（一一九〇～一二七三）《汝南遺事》，亦足補義宗（指哀宗，義宗出於金亡後王鶚之私謚）一朝之事。」[5] 蘇氏並無入局修史，但是他嫻熟金源史事，可能曾寓目《雜編》，因而認識其重要性。至於至正初史館開局，採摭《雜編》記敍入史，《金史》本身有兩處標明。例如下揭的卷一一五〈完顏奴申〉〈傳贊〉，和上引的〈元德明〉附〈子好問〉傳，都說《壬辰雜編》述事信而有徵，足以補充紀載的遺闕，不過並無

3 見姚從吾〈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存中原文化的貢獻〉，《大陸雜誌》（臺北）卷二六，第三期（一九六三、二月），頁一～一二；拙著 (Chan Hok-lam), *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(1115~1234): Three Studies* (Wiesbaden: Franz Steiner, 1970), Pt. II., 續焜《元遺山研究》（臺北：自印本，一九七四），頁一三四～四七；與張博泉、程妮娜、武玉環〈《中州集》與金史〉，刊於陳述主編《遼金史論集》第三輯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一九八七），頁二六一～七八，與王明蓀〈金修國史及金史源流〉，《書目季刊》卷二二、第一期（一九八八），頁四七～六〇。

4 歐陽玄《圭齋文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二，頁一下～二上。

5 蘇天爵《滋溪文稿》，《元人珍本文集彙刊》影元鈔本（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一九七〇）卷二五，頁九七六。楊奐《天興近鑑》已佚，王鶚《汝南遺事》尚存。是書詳記哀宗遷徙蔡州及蒙古圍城事，凡四卷，爲纂修《金史》哀宗紀傳之主要資料，有《四庫全書》影鈔本及其他刊本行。詳見拙著 "Wang O'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"，刊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》（香港：一九八二）（英文本），頁三四五～七五。

點出來龍去脈。

根據上述，特別是歐陽玄的〈詩序〉，元末史館纂修《金史》時所獲得的《壬辰雜編》，只是一帙手稿，不是刊本，因此是編可能不是完卷之作。這部記載，大概是遺山晚年隱居鄉里，致力修史時所編的史料的部分雜稿，始於壬辰年，故冠以此名，但始終未付梓。所以，故姚從吾教授評論此書說：[6]「《壬辰雜編》實際上也就是《壬辰雜稿》，應當是一些有關〈壬辰〉這一年金朝掌故的雜錄，並不是寫成的專書。因爲是雜稿，經人採用後就散亂了，所以沒有流傳下來。」乾嘉間施國祁（一七五〇～一八二四）箋注元遺山詩，長於廣搜博採史料，然大意誤讀《金史・元好問傳》，以爲《壬辰雜編》卽是《金源君臣言行錄》，凡百餘萬言云。[7]此說甚謬，因爲兩者毫無關係，是不同的著作，並未鋟版，俱已失傳，可是近人不察，致易爲施北研貽誤。

《壬辰雜編》究竟何時散失，明清的書誌目錄透露一些線索。英宗正統六年(一四四一），大學士楊士奇（一三六五～一四四四）等編訂《文淵閣書目》，在富字號第二廚目〈史雜〉下標列《壬辰雜編》三册，但是其書已闕，未知官府何時失藏。然而，稍後葉盛編《菉竹堂書目》，却提到他的先人藏書樓收存《雜編》三册，看來卷帙不少。根據葉氏生卒年（一四二〇～一四七四）推斷，是編在明中葉仍有鈔本流傳。[8]不過，現存《書目》是五世孫恭煥輯錄的，到七世孫國華在崇禎七年（一六三四）始付梓，其時藏書有無《雜編》頗成疑問。下及清代，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三）起編修《四庫全書》時，從各地採進的書籍並未見是編。因此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在《遺山集》四十卷下有按語云：「今《壬辰雜編》諸書雖已無傳，然而元人纂修《金史》多本其所著，故於三史中獨稱完善。」由此可見，在乾隆五十九年（一七九四）《提要》刊行之時，《四庫》編纂皆以爲是書經已亡佚。[9]

不過，看來《壬辰雜編》在乾隆間尚未失傳，因爲凌廷堪（一七五五～一八〇九）編《元遺山年譜》（有嘉慶元年〔一七九六〕序），終卷評論元好問著述存佚

6 見上揭姚著，頁一〇。

7 施國祁《元遺山詩註》（四部備要本）〈傳銘〉，頁六上。最近姚奠中爲山西古典文學會所編之《元好問研究論文集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七）撰寫〈前言—從北朝、遼、金說起〉，亦沿襲施北研的錯誤，謂元氏百餘萬言的《壬辰雜編》卽是《金源君臣言行錄》（已佚）（頁三）。實則，蘇天爵在〈三史質疑〉將《壬辰雜編》與《金源君臣言行錄》分列，已明示二者有別。對於後者則言：「所述野史《名臣言行錄》未及刊行，當訪求於其家。」（頁九七八）

8 見楊士奇《文淵閣書目》（叢書集成本）卷六，頁六九；葉盛《菉竹堂書目》（同上本）卷二，頁四四。

9 永瑢等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三四）卷一六六〈別集類〉十九，頁三四六五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略言：「《壬辰雜編》或云已佚，偃師武虛谷進士（武億，一七四五～一七九九），嘗與余言朱竹君學士（朱筠，一七二九～一七八一）有此書。戊申冬（乾隆五十三年〔一七八八〕），詢之朱少白同年（錫庚），云「幼時見家有藏本」，亦不知其確否也。興化任幼植禮部（大椿）（一七三八～一七八九）云，聞江南藏書家尚有之，而未之見，當再覓之。」[10] 如果凌次仲記事確鑿，《壬辰雜編》的鈔本，到嘉慶初年仍存人世。此外，清人所輯補的《金史・藝文志》，如倪燦、金門昭、龔顯曾諸家，但列其目，未言卷帙。民初孫德謙刊《金史・藝文略》，於《壬辰雜編》目下幷引歐陽玄前揭〈詩序〉及《菉竹堂書目》著錄，但訛書「三册」爲「三卷」，需要抉剔更正。[11]

三、

由於《壬辰雜編》經已佚亡，無由取之勘對《金史》，要考究元末史館如何取捨剪裁以入紀傳就有困難，必須從多方面鑽研推測。從《金史》本身及元代著述，參照時賢稽鈎所得，我們找到一些提示，證明史官曾將《雜編》部分資料鈔入《金史》。下面列舉三例。

㈠卷一一五〈列傳〉第五十三〈完顏奴申〉[12]

完顏奴申字正甫，宣宗時策論進士，正大三年（一二二六）由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說書官，五年轉吏部侍郎，以御史大夫奉使蒙古，翌年復往，八年（一二三一）始還，拜參知政事。天興元年春，大朝軍圍攻汴京，十二月辛丑，哀宗倉皇出走歸德，隨遷蔡州（今河南汝陽），行前以奴申兼樞密副使，與完顏習捏阿不等總諸軍留守京師。是時都城內外不通，米價騰漲，百姓糧盡，民間洶洶，於是有議立皇兄荆王（守純）監國。二年（一二三四）正月丙寅，省令史許安國與左司都事元好問諸人詣都堂質詢，問保社稷、活生靈之策，然二相無計可出，但曰「死守」而已。翌日，西面元帥崔立率黨爲亂，闖入省府，麾衆殺害奴申與阿不，隨詣蒙古統帥納款請降，事見其後〈崔立傳〉。

〈本傳〉冗長達千五百字，史源略見卷末〈傳贊〉，有言：「劉京叔《歸潛

10 凌廷堪《元遺山先生年譜》，收入《安徽叢書》第四期（一九三四），卷下，頁三一下。

11 見倪燦等撰《遼金元藝文志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五八），頁一六，五一，九七。參見楊家駱《新補金史藝文志》，刊張其昀監修《金史》（臺北：國防研究院，一九七〇）下册，頁一七～一八。

12 《金史》卷一一五，頁二五三三～二六。

志》與元裕之《壬辰雜編》二書雖微有異同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。」[13]這是說〈奴申傳〉取材於上述二書。因爲汴京被圍之時，劉祁與元好問皆在京城，目擊時事，故此記述的都是親歷聞見。《歸潛志》今日猶存，因此持〈本傳〉與之參校，將其雷同片斷鉤出，餘下的豈不是《壬辰雜編》的原稿？從這個指標著手，我們不難分辨史料，將其還復原狀。

首先，檢讀《歸潛志》紀事部分，我們見到〈本傳〉好幾處是從前者撮錄，稍加調整潤色。例如敍汴京被圍，食糧匱絕事：「時汴京內外不通，米升銀二兩，百姓糧盡，……緡紳士女多行乞於市，至有自食其妻子者。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，貴家第宅，市樓肆館皆撤以爨。……」顯然是採自《歸潛志》卷十一〈錄大梁事〉：「二守臣素庸闇無謀，但知閉門自守。百姓食盡，無以自生，米升直銀二兩，貧民往往食人殍，死者相望。……緡紳士多行丐于街，民間有食其子。……又日日殺馬牛乘騎自啗，至於箱篋，鞍轡諸皮物，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，其貴家第宅、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撤以爨。……」[14]至於下面所記天興元年正月丙寅，省掾諸人擁集質詢奴申，阿不二相如何保衛京師，內容與劉祁記敍有異，似另有所本（見後），但亦有數處採自《歸潛志》。〈本傳〉記云：「或曰是時外圍不解，如在陷穽，議者欲推立荊王以城出降，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，況北兵中已有曹王也。衆憤二人無策，但曰『死守』而已。」此段係撮鈔自〈錄大梁事〉同卷：「時外圍不解，上下如在陷穽中，且相繼殍死。議者……推立皇兄荊王，以城降，庶可救一城生靈。……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，紀季以酅入于齊之義，不得已者。況北兵中有曹王也，朝士皆知，莫敢言。二守臣但曰：『當以死守』，衆憤二人無他策。……」不同之處是劉祁敍其事於諸省掾詣都堂之前，而《金史・奴申傳》則將其置於衆人質詢二相之後。[15]

此外，〈本傳〉末段總結金末寖政所引劉祁評論，亦係採自《歸潛志》。論曰：「金自南渡之後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，臨事相習，低言緩語，互相推讓，以爲養相體。每有四方災異，民間疾苦，將奏，必相謂曰：『恐聖主心困』。事至危處輒罷散，曰『俟再議』，已而復然。或有言當改革者，輒以生事抑之，故所用必擇便熟無鋒銛、易制者用之。每北兵壓境，則君臣相對泣下，或殿上發長吁而已。兵退，則大張具，會飲黃閣中矣。因循苟且，竟至亡國。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

13 同前書，頁二五二六。關於《歸潛志》對纂修《金史》的貢獻，詳見拙著〈《歸潛志》與《金史》〉，《大陸雜誌》卷二五，第八期（一九六二，十月），頁一三～一七。

14 《金史》，頁二五二四；劉祁《歸潛志》（崔文印點校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三），頁一二六。

15 《金史》，頁二五二五；《歸潛志》，頁一二七。

台鼎，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『近來朝廷紀綱安在？』七斤不能對，退謂郎官曰：『上問紀綱安在，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。』故正人君子多不見用，雖用亦未久而遽退也。」以上一段，係摘錄《歸潛志》卷七劉祁論金末蔽政事，原文分兩條，較冗長，其言曰：「南渡之後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，上下同風，止於苟安目前爲樂。凡有人言當改革，則以生事抑之。……」「……又宰執用人，必先擇其無鋒鋩，軟熟易制者，曰『恐生事』，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，雖用亦未久，遽退閒。……」至於〈本傳〉所引宣宗斥責丞相僕散七斤語，亦出於《歸潛志》是卷，載於卷末，文字雷同，顯然未有刪節。[16]

以上我們已將〈奴申傳〉所鈔錄《歸潛志》各條列舉，那末其餘的傳文是否全出《壬辰雜編》？此亦不然，因爲《雜編》是記載耳聞目見的雜稿，不是體例完備的史書，故此〈本傳〉卷首記述完顏奴申的仕履，應該另有來源。依照元修《金史》的體例，這些細節，大概從〈哀宗紀〉（卷十七～十八）摘錄。[17]這樣看來，〈本傳〉所取資於《壬辰雜編》的，應該是記述元好問在省署與許安國質詢奴申、阿不二相的談話，如下面一段：[18]

> 天興二年正月丙寅，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：「古者有大疑，謀及卿士，謀求庶人。今事勢如此，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，問保社稷、活生靈之計。」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奴申，奴申曰：「此論甚佳，可與副樞議之。」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爲然。好問曰：「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，又遣使迎兩宮。民間洶洶，皆謂國家欲棄京城，相公何以處之？」阿不曰：「吾二人惟有一死耳。」好問曰：「死不難，誠能安社稷、救生靈，死而可也。如其不然，徒欲一飽五十紅襖軍，亦謂之死耶。」阿不款語曰：「今日惟吾二人，何言不可。」好問乃曰：「聞中外人言，欲立二王監國，以全兩宮與皇族耳。」阿不曰：「我知之矣，我知之矣。」即命召京城官民，明日皆聚省中，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。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，二相命好問受其詞。白之奴申，顧曰：「亦爲此事也。」且問副樞「此事謀議今幾日矣？」阿不屈指曰：「七日矣。」奴申曰：「歸德使未去，愼勿泄。」

此段大部分是元好問與二相的對白，所以無疑出於他的手筆。雖然，如前所示，當日目擊朝議的還有劉祁，在《歸潛志》〈錄大梁事〉裏有記述其事。[19]不過，

16 《金史》，頁二五二六；《歸潛志》，頁七〇～七九。

17 見《金史》卷十七，頁三八一～三八六；卷十八，頁三九五～三九六。

18 《金史》，頁二五二五。

19 見《歸潛志》，頁一二七。

臺灣大學歷史期刊資料庫

在都堂公開議論如何保衛京師之前，與二相交談的，惟有好問一人。（前段載言：阿不歹語曰：『今日惟吾二人，何言不可」，便是佐證。）因此，記錄此一對白的，捨遺山本人莫屬。《壬辰雜編》以記述時事聞見爲主，所以這段談話便在此處保存下來，爲史官提供獨有的資料。

㈡卷一二三〈列傳〉第六十一〈完顏陳和尙〉附〈完顏斜烈〉[20]

完顏斜烈漢名鼎，字國器，畢里海世襲猛安，自壽、泗元帥轉安平都尉，鎭商州（今河南商縣），威望甚重，敬賢下士，有古賢將之風，正大三年卒。《金史》〈本傳〉附從弟完顏陳和尙（彝），甚簡略，僅八十六字，事蹟皆據遺山記錄，而主要來自《壬辰雜編》。前揭歐陽玄〈送振先宗文歸祖庭〉詩序，提及曾在翰林故府所蒐金人遺書見到《壬辰雜編》一帙，其言說：[21]

> 歐陽公（修）晚年乞守洪州，累表不得請，於是歸江右之志遂不果。……南渡以後，宋人多議公此事。洪景盧、楊廷秀之賢亦不免有此意。甚者，謂公子孫居潁爲金人所戕而遂絕，是大不然。近年秦詔修三史，一日，於翰林故府中攟金人遺書，得元遺山裕之手寫《壬辰雜編》一帙，中言安平都尉完顏斜烈，漢名鼎，字國器，嘗鎭商州，偶搜伏，於竹林中得歐公子孫甚多，以歐公之故，並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。則知未嘗殲於金兵也，此好事者爲之辭，明矣。元遺山金士領袖，生平極重歐陽公，嘗有詩云：「九原如可作，吾願從歐陽。」北人至今佩服其言。……

此處指出由於遺山記載完顏斜烈的偉行，得知靖康難後，歐陽修子孫仍倖存商州（今河南商縣），並不如齊東野言，謂已盡殲於金兵。從這一殘存斷簡，比對《金史》本傳所記：「鎭商州，威望甚重，敬賢下士，有古賢將之風。初至商州，一日搜伏，於大竹林中得歐陽修子孫，問而知之，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」，顯而易見的，下半段是從《壬辰雜編》迻錄。至於先前兩句：「敬賢下士，有古賢將之風，則係摘自遺山爲完顏陳和尙撰之〈贈鎭南節度使良佐碑〉。[22]元好問與完顏從兄弟情誼頗篤，於斜烈尤其，正大三年（一二二六），斜烈罷商帥職，例爲總管，屯方城（今河南方城縣），曾徵召好問，免其從軍，其事略見遺山詩〈卽事〉自注：「商帥國器見，免從軍」。此外，遺山有又有詩詞數首述及彼此間

20 《金史》，頁二六八三。

21 同上註4。這裏歐陽玄引元好問詩誤記下句，原詩出〈贈劉御史璽卿第三首〉，末二句云：「九原如可作，吾欲起韓歐」。見《元遺山詩註》卷一，頁十四下。

22 見《遺山先生文集》卷二七，頁十四上。

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

酬酢。[23] 事實上，若果編修史官未曾寓目《壬辰雜編》與遺山所撰〈良佐碑〉，大概不會爲之立傳，因爲除却元好問記述他搜獲歐陽修的子孫，完顏斜烈並無其他偉蹟奇行傳世，這可見《壬辰雜編》的特殊價值。

㈢卷一二四〈列傳〉第六十一〈忠義四〉〈完顏絳山〉[24]

完顏絳山是哀宗的奉御，系出始祖函普，天興二年十月，蒙古大軍攻破蔡州城，哀宗自縊，近侍皆走避，獨絳山留不去以收其遺骸，葬於汝水之濱，時人義之。他的傳記史源不詳，時賢崔文印校證宇文懋昭（？）《大金國志》，比較《國志》與《金史》〈本傳〉，發覺二者所記絳山事蹟，大同小異。由於懋昭撰〈國志〉時未見《金史》，不可能從後者鈔錄，故此認爲此傳可能出自《壬辰雜編》，其言說：[25]

> （《大金國志》）卷二六〈義宗〉一卷，……史文除一部分取自《汝南遺事》、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外，似別有所據，而且多可與《金史》相印證，特別是關於完顏絳山葬義宗一事，和《金史》之記載簡直如出一轍。今將兩書的記載並列於下。……（從略）……一看就很清楚，這兩段文字，除了個別字句不同外，……關鍵的問答和情節，基本，甚至完全相同，它使我們相信，這兩段記載同出一源是無可懷疑的。據元人蘇天爵說：「（金）國亡之後，元好問述《壬辰雜編》、楊奐《天興近鑑》、王鶚《汝南遺事》，亦足補義宗一朝之事。」（……《三史質疑》）但《金史》的修撰者只偶提及《天興近鑑》一次，《汝南遺事》甚至一次也未提及，而强調「劉京叔《歸潛志》與元裕之《壬辰雜編》二書，雖微有異同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。」（……〈完顏奴申傳〉）由於《歸潛志》不載完顏絳山事，則上述兩段記載出自《壬辰雜編》則是很可能的了。……但蘇天爵也同時指出：「葉隆禮、宇文懋昭爲遼、金《國志》，皆不及見國史，……」這就排除了本書的記載或許鈔自《金史》

23 〈卽事〉詩末句云：「到家慈母應相問，爲說將軍禮數寬」，見《元遺山詩註》卷九，頁十八上。遺山所撰詩與斜烈有關者另有三首：〈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〉，〈中秋雨夕〉，〈徘體雪香亭雜詠〉第六首，見《詩註》卷八，頁十四上，二二下；卷十二，頁三上。亦有詞三關：〈滿江紅〉、〈水龍吟〉、〈三奠子〉，俱作於正大三年，見吳庠《遺山樂府編年小箋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三），頁三七～四〇。以上詩詞繫年考定係根據繆鉞〈元遺山年譜彙纂〉卷上，載《國風月刊》第七卷第三期（一九三五、十月），頁三九～四〇。

24 《金史》，頁二七〇五～六。

25 見宇文懋昭《大金國志校證》（崔文印校證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六）上册，〈前言〉，頁六～八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的可能性。……

崔氏所校證《國志》，雖然體例失當，注釋欠周，但是此處別具慧眼。這因爲在金末河南沸鼎之際，史官播越，無由記注，能够秉筆的若不是身陷其境（如王鶚被困於蔡），就是撫拾時人聞見，書之於編。當日蒐羅散佚，以史筆自任的，僅有劉祁、王鶚與元好問三人。既然上述二者的著述（《歸潛志》與《汝南遺事》），都未見完顏絳山的記載，[26] 他的傳記惟一史源，只有來自元好問，而在遺山的叢稿中，最可能記載這樣的貞忠事蹟，就是《壬辰雜編》。因此，雖然崔氏謙遜地說：「可惜《壬辰雜編》現已亡佚，我們無由確證」，這一推斷很合邏輯，可以接納，故此本文也把《金史、完顏絳山傳》的史源，歸諸於《壬辰雜編》作爲殿筆。

四、

總括上述，雖然囿於資料，我們對《壬辰雜編》只能作粗略蠡測，但是歸納排比所及，可以獲得若干結論。首先，《壬辰雜編》是元好問一部記載天興壬辰、癸巳這兩年間時事聞見的雜稿，並未付梓，但有鈔本流傳，大概到清嘉慶間始佚。過去認爲《雜稿》只記錄壬辰這一年的野史是錯誤的，因爲從《金史》本身探討，遺山的記載迄於亡國，包括蔡州城破、哀宗自縊等事情。還有，這部雜稿大概以敍述史事爲主，不多涉及掌故瑣談，因爲遺山另有《續夷堅志》一書（今存），專門記載小說志怪之類的軼聞。[27]

其次，從以上考證，我們可見到《壬辰雜編》所記載的時事聞見的一些特點。從《金史、完顏奴申傳》鈔錄的片斷來看，元好問把當日汴京被圍，在省署質詢完顏奴申、完顏習捏阿不二相關於救亡之道，與二者的談話記錄下來，顯然是要保存歷史的見證，以史官自任，作爲纂史的資料。《雜編》另一特點見於歐陽玄〈詩序〉所引，後來鈔入〈完顏斜烈傳〉的一節記述斜烈搜獲歐陽修子孫的事蹟。這裏可見遺山對歐陽修的尊崇，和對北方著名宗族的存亡的關切，因此筆之於編以爲修史採摭。至於《金史、完顏絳山傳》所記絳山眷念故主，蔡州城破獨留不去，收葬哀宗遺骸，假若原出《壬辰雜編》的話，足表現遺山對忠君節義的行爲極爲重視，特意記錄作爲表彰。這類金末忠貞義勇的事蹟，在《遺山文集》收錄的碑版誌銘頗多記

26 王鶚《汝南遺事》因爲紀事止於金亡，所以未載絳山的事蹟，然於卷末〈總論〉說：「近侍如絳山氣不奪者以萬卒，死於社稷，上下一同，書之簡編，古今無愧。」見《讀輔叢書》本（一八九七）卷四，頁九上。

27 關於《續夷堅志》的研究，參考李正民〈試論元好問的志怪小說集《續夷堅志》〉，與李峭倉、蔚潤明〈元好問《續夷堅志》淺析〉，俱收入前揭《元好問研究論文集》，頁二三三～四六，頁四七～五二。

錄，正是好問史學的一大特色。

最後，必須一提，元好問《壬辰雜編》記載的金末史料，所以能够保存，主要是元末纂修《金史》的史官肯定其特殊價值，因而剪裁入史，不然可能就此散佚。這些以歐陽玄爲總裁的修撰，把遺山在蒙古圍攻汴京時，在省署與完顏奴申、完顏習捏阿不二相的談話載錄於史，因爲好問是時事的見證而且曾將其事書之於編。遺山記載完顏斜烈搜獲歐陽修子孫的事情，對他本人尊崇前賢固然有關，但是這一條之能入史，又因爲《金史》的總裁是歐陽修的同宗後輩，希望藉此保存宗族的記錄。至於完顏絳山的貞忠事蹟獲得載錄於《金史》〈本傳〉，亦因爲修撰根據纂修凡例，認爲這種儒家忠君的義行應該表彰，若果史官有異議，這件史事會湮沒無聞。由此可見，《壬辰雜稿》的顯晦，與元末官修《金史》的去取有重大關係，必須加以鑽研，始能深入了解元好問的史學貢獻。[28]

（本文承王德毅教授指教，並協助校對，謹申謝意）

參考書目

《金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五）。
楊家駱《新補金史藝文志》，刊張其昀監修《金史》（臺北：國防研究院，一九七〇）。
倪燦等撰《遼金元藝文志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五八）。
宇文懋昭《大金國志校證》（崔文印校證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一九八六）。
劉祁《歸潛志》（崔文印點校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三）。
歐陽玄《圭齋文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。
元好問《遺山先生文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〈附錄〉。
施國祁《元遺山詩註》（四部備要本）。
郝經《陵川集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》第四集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）。
蘇天爵《滋溪文稿》，《元人珍本文集彙刊》影元鈔本（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一九七〇）。
楊士奇《文淵閣書目》（叢書集成本）卷六，頁六九；葉盛《菉竹堂書目》（同上版本）頁四四。
凌廷堪《元遺山先生年譜》，收入《安徽叢書》第四期（一九三四）。
永瑢等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三四）。
吳庠《遺山樂府編年小箋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二）。
繆鉞〈元遺山年譜彙纂〉卷上，載《國風月刊》第七卷第三期（一九三五，十月），頁三九～四〇。
王鶚《汝南遺事》畿輔叢書本（一八七九）。
續焜《元遺山研究》（臺北：自印本，一九七四）。
姚奠《元好問研究論文集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七）。
張博泉、程妮娜、武玉環〈《中州集》與《金史》〉，刊於陳述主編《遼金史論集》第三輯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一九八七）頁二六一～七八〇。
李正民〈試論元好問的志怪小說集《續夷堅志》〉，與李峭倉，蔚潤明〈元好問《續夷堅志》淺析〉《元好問研究論文集》，頁二三三～四六，頁四七～五二。

28 關於纂修《金史》的史源問題，詳見上註3所揭英文拙著，第一章，與王明蓀所撰論文。

姚從吾〈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存中原文化的貢獻〉，《大陸雜誌》（臺北）卷二六，第三期（一九六三、二月）頁一～一二。

王明蓀〈金修國史及金史源流〉，《書目季刊》卷二二，第一期（一九八八），頁四七～六〇。

拙著〈《歸潛志》與《金史》〉，《大陸雜誌》卷二五，第八期（一九六二，十月）頁一三～一七。

Chan, Hok-lam, *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(1115-1234): Three Studies* (Wiesbaden: Franz Steiner, 1970), Pt, II.

Chan, Hok-lam, "Wang O'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"，刊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》（香港：一九八二）（英文本）頁三四五～七五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